

徐铸成 著

杜月笙正传



華軍站

形不
全遭

日本發田
發生風烈地

軍被殲滅逾半
方南進野心益亟
將佔那國納事局

英軍訓法案公佈
下地防範日機行

日竟向英提
英蘇繼續進行談
英因表示援華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外信

華北奮鬥



徐铸成 著

杜月笙正传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杜月笙正传 / 徐铸成著. —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
2018.9
ISBN 978-7-108-06336-6

I. ①杜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杜月笙 (1888-1951) — 传记
IV. ① K828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31752 号

责任编辑 卫 纯

装帧设计 薛 宇

责任印制 宋 家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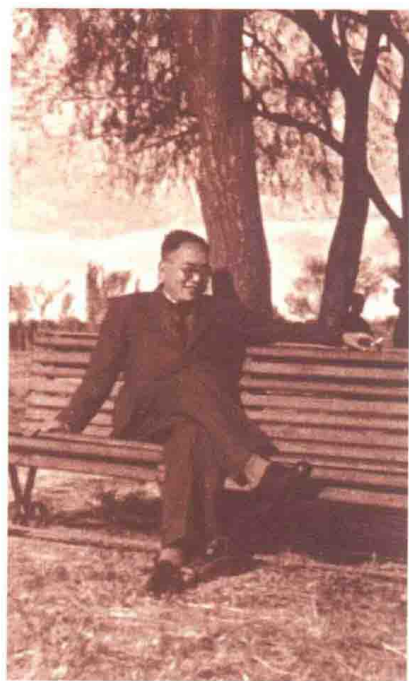
开 本 889 毫米 × 1194 毫米 1/32 印张 5.5

字 数 101 千字

印 数 0,001—5,000 册

定 价 45.00 元

(印装查询: 01064002715; 邮购查询: 01084010542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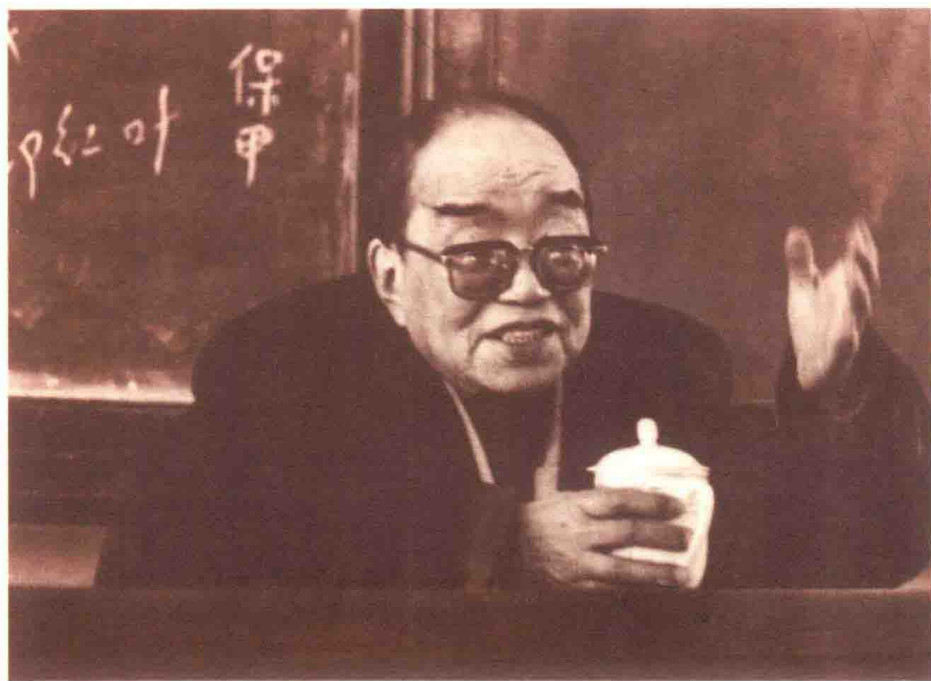
1945年10月，由渝返沪后，
摄于上海中山公园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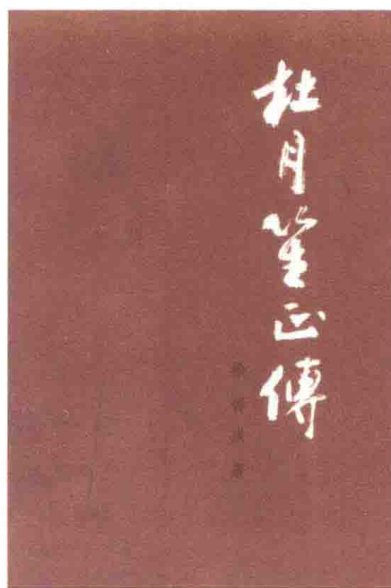
1980年8月，摄于上海人民公园



1980年冬，在上海重庆北路寓所



80年代徐铸成在复旦大学
新闻系演讲



《杜月笙正传》初版书影，
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

编者的话

《杜月笙正传》是徐铸成先生晚年的著作中题材别致，又受到广泛关注的一部人物传记。1981年初，作者应邀在上海《青年报》连载这部作品。1982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，1994年由台湾克宁出版社出版。曾收入学林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《徐铸成传记三种》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出版的《杜月笙正传·哈同外传》。

《杜月笙正传》出版后，作者发表了《为什么给杜月笙立“传”》，曾收入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旧闻杂忆补篇》，现附于书后。

杜月笙是旧上海的“海上闻人”，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角色。为这样的曾被视作负面形象的人物立传，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坛，称得上是破格之举，给当时几乎千人一面的人物传记长廊增添了新的形象。

目 录

前 言 . . .	1
楔 子 . . .	3
早年的历程 . . .	11
青出于蓝 . . .	22
几个侧面 . . .	31
鲜红的血迹 . . .	40
跻身工商界 . . .	49
轰动一时的闹剧 . . .	56
三头六臂 . . .	65
国难当头 . . .	70
恒 社 . . .	81
“八一三” . . .	91
香港四年 . . .	100

雾重庆	· · · 116
物资“交流”	· · · 126
“衣锦荣归”	· · · 137
彷徨狡兔	· · · 148
尾声和小议	· · · 160

附 录

为什么给杜月笙立“传”	· · · 167
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前 言

这几年，我写了三四本书，分别在上海、香港等处出版，内容基本是亲身经历的旧闻，而且大都是随笔式的，记起什么就写什么。因为有一种“紧迫感”，自己的经历虽微不足道，但几十年所见所闻，颇多关联到旧时代演变的脉络，写出来可供后人参考。自己虽“年方七五”，毕竟记忆力日益衰退了，如果经再三考虑，订出计划后才系统动笔，怕时间“稍纵即逝”，有些应该“留”下的史料，因此要白白地“带”走了。近年来，不是号召对老年同志要“抢救”史料么？我这是抓紧时间，自我“抢救”。

所写的《报海旧闻》第一册，布局上虽似有一体系，而所写的人和事，仍然是片断的，参差不齐的。

这次试写《杜月笙正传》，不免有些胆怯，仿佛演惯小戏的人，一旦要排练整本的连台大戏，感到功力够不上，而且所写的“角色”，是这样复杂，脸谱色彩又这么阴暗，牵涉面似乎又很广，如何写得近似而不失真呢？

鼓励我尝试的，主要是三中全会以来的实事求是的精神，不必求大求全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圣人未必没有缺点，“反面人物”在某些方面也可以“一分为二”。总之，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，不全盘肯定，也不一笔抹杀，这样，写出的人物才可能有血有肉，能够生动地再现其本来面目。

而且，我写“正传”的主要意图，是想通过这个具体的人物，从一个角度来描述当时社会的概貌，尽可能把它挖得深一些，让不管有无昨天经验的广大读者，更加珍惜今天，努力创造分外美好的明天。

由于我对这个“人物”及其所“君临”的“社会”不够熟悉，看到的资料又不多，该写而遗漏的一定不少，事实出入也在所难免；尤其因为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水平太低，在具体分析中，肯定有不少是不恰当甚至是错误的。

在写述过程中，幸得许多老同志的指引和匡正。初稿一部分在上海《青年报》上刊出后，又得到许许多多读者来信，他们热烈鼓励，并提供材料，补正缺漏，这使我非常感激。来信未能一一答复，尤为歉疚。

报社和出版社朋友们的帮助，是成书的主因。特别是吴纪椿同志，从选题到整理，他是一直和我一起操心、流汗的。

作者

1981年11月于上海

楔 子

本篇要给一个号称“海上闻人”的人物立传，此人就是杜月笙。

“海上闻人”，要加个引号，不仅因为这个名词老早已经过时，而且“海上”和“闻人”，都有特定的含义，该作一些解释，特别对青年朋友来说。

“闻人”似乎和“名人”相通，但绝不能画等号，更和现在常用的“知名人士”，意义完全不同。

比如，过去如称胡适博士或发明四角号码的王云五为名人，他们会欣然点头；如果称他们为“闻人”，他们一定要勃然大怒，认为是极大的侮辱。相反的，在杜月笙、王晓籁之流的头上，必定要加上“闻人”这顶“桂冠”，才感到不失他们的“身份”。可见称呼也要恰合头寸，像“帽子”一样，不能乱戴。

那么，“闻人”和“大亨”是否相同呢？那又不然。在旧上海，到处可见有挺胸凸肚、跷着大拇指的人横行过市；

在一定的场合，他们也“说话算数”，有权威性。他们往往被称为“大亨”，受到周遭的畏惧。但他们和“闻人”之间，毕竟还有很大的差距，正如瘪三和“大亨”之间存在有地位、声势、能量的差距一样。

在旧上海的报刊上，经常冠以“闻人”头衔的人，总数大概至多不超过二十个吧。其中像虞洽卿、王晓籁是商界人士，黄金荣、杜月笙、张啸林等无恒产，甚至没有固定的职业，但可以挥金如土，一呼百诺。他们没有什么高官显爵，而那些达官贵人、军政显要，见了他们仿佛都还矮了一截，趋奉唯恐不及。他们没有一技之长，而盛名远播，威灵显赫。

尤其是杜月笙，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“十里洋场”上，连蒋介石、帝国主义分子、租界当局也要“买”他的“账”。同是“闻人”，虞洽卿、王晓籁成名还比杜早，但一切还要看杜的颜色行事，有时还要借助于他的声光。

不是过甚其辞。我是1927年起先后在北京、天津、汉口当新闻记者的。1936年《大公报》增设上海馆，我来沪安家落户，住在当时的法租界。那时，几乎每一地段，都有些“大亨”“瘪三”之流分片“统治”，如果不向他们“烧香”，或者他们要索不遂，说不定哪一天，晾着的衣服会全被抢去，或者灶间的窗户里忽然泼进一盆污水，甚至会平白遭到一顿毒打。

当时，上海的报纸，以《新闻报》销数为最多，主要因为经济市场新闻最详尽，也因为它的广告最多、最齐全，连理发店、澡堂乃至“夫妻老婆店”——烟纸店，也家家要订一份。主要是为了查看广告。

这些“闻人”“大亨”之流，今天是“小儿完婚”，明天是“小女出阁”，还有“太夫人六十寿诞”，或者“先太爷八十晋一冥寿”，这类的广告，每天总占报纸很大的篇幅。你在这个地段开业，对这类“红白喜事”失之疏忽，没有尽“礼”，那么，不出几天，飞来横祸就会临头了！

再举一个我亲历的例子：《大公报》本是北方的报纸，来上海出版，自然不为当地各大报所“欢迎”；创刊那一天，读者纷纷打来电话，说买不到报。我们以为“新出炉的饼子”受到喜爱，被抢购一空了；第二、第三天一再加印。哪里知道，函电交驰，质询的更多，经派人调查，原来这三天的零售报纸，全被“有人”收进了。报摊上压根儿没见一份。好比名角儿唱戏，“打泡”三天，戏票全给人“吃进”，池座里空荡荡的，一个观众也没有，请问如何再唱下去？这显然是要把初生婴儿扼死在摇篮里。《大公报》的总经理胡政之急了，连忙求助于法国哈瓦斯通讯社的中文部主任张翼枢。张那时是法租界公董局的董事，又是杜府的清客之一（名义是法文秘书），由他牵线，《大公报》备了一份厚礼，杜月笙答应应用他的名义，出面请客；如此，各大报的负

责人当然不能不应邀准时参加。席间，只由张翼枢致辞说：“杜先生关照说，《大公报》出版，希望各位多多帮忙。”一句话，就吹散了一天云雾，《大公报》第二天就在报摊上露面，胡政之总算渡过了一重难关。

流氓帮会势力，大概在我国的封建社会植根很深，蔓延很广。我在儿童时代，就听到我们家乡宜兴这个小县城里，有一个大名叫徐老二的（当然和上海后来号称“徐老三”的徐景贤并无关系，论年龄，他该是“徐老三”的祖辈），不务正业，经常出入于烟馆、赌场；钱花光了，他总拿着一把其实没有底的茶壶，在街口游逛，看到进城来的农民，就故意靠近一挤，茶壶“失手”坠地。于是，他就揪住这个农民，硬说茶壶被碰跌了，而且声称，这是一个家传的宝壶，不仅泥色难得，还出于名匠之手。结果，总要把这个农民的口袋翻空才罢休。后来，我在京津、武汉，也听到不少流氓横行的故事，但似乎都没有“闻人”这个称谓。看来，这是“十里洋场”里所特有的。

为了说明“闻人”这个名称，噜噜苏苏说了以上一大套话。

至于“海上”，就比较简单了。当然，它并不像“沪”“春申”“歇浦”那样，是上海简单的别称，它是和“十里洋场”联系起来的，好像也有特定含义的。不是常常有人讲什么“海”派作风吗？

为这样一个“名震中外”的头号大“闻人”立一个

“传”——记述他的生平“业绩”，自然很有意义，但要我来写，却选非其人。因为我对上海的近代历史，很少研究。和这位“闻人”只有“一面之缘”，在相识的朋友中，又很少曾涉猎这个“社会”。只是在“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前，曾参加市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，为了搜集旧上海的史料，曾邀请一些“老上海”和熟悉这方面情况的先生们多次座谈，还曾找到杜的门徒乃至保镖、看门的，听他们口述回忆，也曾看过文史馆及历史研究机关整理出的若干材料，如此而已。

谈到这“一面之缘”，也很偶然。大约在1940年，那时，上海早成孤岛，这位“闻人”已移居香港；在《文汇报》被敌伪摧毁后，我也于1939年秋去香港《大公报》主持编辑工作。有一天，就是上面所提到的张翼枢，忽来找我和经理金诚夫兄，取出两张请帖，说：“杜先生明天生日，今晚请两位去吃寿酒。”我们说：“我们和他素无来往，不便叨扰吧。”他立即一脸秋霜地说：“明天是正日，朋友给他做寿，当然不便屈尊两位。今晚是暖寿¹，他请客，如果不去，恐怕太不给他面子吧。”这显然带有威胁的口气，我和金兄交换了眼色，就决定跟他去见识见识这种场面。

1 在旧社会，生日的前一天，有钱的主人往往先宴宾客，名曰“暖寿”。